

沧桑文丛
主编 ■ 李辉

悔余日录

冯亦代 著
李辉 整理



冯亦代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主 编 李 辉

悔余日录

冯亦代 著
李 辉 整理

CANGSANG WENCONG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悔余日记/冯亦代著,李辉整理.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6

(沧桑文丛/李辉主编)

ISBN 7-215-04663-X

I. 悔… II. ①冯…②李… III. 冯亦代-日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8026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1.5 字数 133 千字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册

定价:20.00 元

“沧桑文丛”总序

每个人都生活于沧桑之中。

沧桑是时间的流动。昨天、今天、明天，在流动中构成一个整体。如同一条河流的水，尽管来自不同山川，一旦流在一起，便浑然一体，无法将之一一分开。

沧桑也是空间的存在。同一个时刻，同样的阳光照耀下，或者同一场风雨之中，每个人都不会重复同样的故事，而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便使流动着的沧桑变得丰富起来。

对于每一个个人而言，在他的心灵世界里，沧桑便是时间与空间的结合。他在时间的流动中感受着历史，他在空间的存在中感受着世界，或者说，两者从来就是一体的。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与现实、个人与群体、抽象与具体的交叉渗透中，沧桑才赋予人的情感、思想、人生一种

沉甸甸的分量。

大概还没有别的时候,比走近世纪末并跨入新世纪门坎时更让人感到“沧桑”这个词的含义。似乎在这样的时刻,人们才更深切地感受到时间的流逝与人生、社会的变迁。不管他处在什么历史位置,不管他的过去是如何走过,回首往事,抚摸流逝的日子,都将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而对更多的读者来说,处在世纪转折时刻,历史的好奇心也将愈加强烈。他们知道,阅读他人的人生故事和昔日的历史场景,实际上已成为自己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

一个即将成为过去的世纪是如何走过,在这个世纪的舞台上人们是如何出演着生活的戏剧,将成为一个长久的话题,把今天和明天的读者深深吸引。

主编一套“沧桑文丛”的构想,便在这样一种感受中形成。

“沧桑文丛”将以回忆录和传记为主,并适当选择一些不同历史时期的日记、信件等能够真实反映历史原状的作品。作者或传主不受其名望、地位、职业的限制,题材不受题材大小重轻的限制,风格也尽可能多样化。

不猎奇,不虚饰,历史的真实应该是“沧桑文丛”的灵魂与品格。

重要的当然在于,文丛中的作品,能够留下这个世纪的影子和声音,能够为下个世纪的人们,提供真实的历史

记录。我相信,真正具有历史价值的作品,才会受到读者的青睐,才是“沧桑文丛”这种类型的丛书的生命力之所在。

愿这样一套丛书,以它独有的姿态,伴随着读者走进新的世纪。

李 辉

1997年1月28日

整理说明

这里整理出版的是冯亦代写于 1958—1962 年间的日记。

在 1957 年反右运动中,冯亦代因鸣放期间发表的言论,成为外文出版社和民盟北京市委的重点批判对象。从本书选录的一篇当时发表于《人民日报》上的报道《冯亦代阴谋篡夺外文出版社》,读者可略见当年情形。反右运动后,冯亦代被定为右派分子而接受改造。从成为右派分子到摘掉“帽子”的几年时间里,冯亦代诚恳接受对自己的批判,变得更加谨慎,对自己的改造也要求甚为严格。他当时把一系列日记起名为《悔余日录》,其心情可见一斑。

冯亦代的这些日记,详尽记录了他成为右派分子后的日常生活,包括人际交往、读书情况和心理活动。从文

字看,颇为真实可信。陷入逆境后的痛苦,被改造者的无奈,依然强烈的求知欲望,对平等身份的企盼,紧紧交织在一起,凸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弱者的形象。同时,他在日记中还记录了与一批右派知识分子当年的往来情况,他们中间有费孝通、潘光旦、陈铭德、邓季惺、章伯钧、罗隆基、丁聪、储安平、浦熙修、董乐山等,这也就使《悔余日记》成为一个群体的生活片断的写照。

今天来看,《悔余日记》无疑具有特殊的历史文献价值。它记录的是个人的生活与思想状况,但却从一个特殊角度呈现出被打入另册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窘状和精神脉络。这对于剖析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梳理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有着其他文本不可替代的作用,故加以整理予以出版。整理过程中除个别字句由作者略为删节外,基本保持日记原貌。个别人名因辨认不清或其他原因,以符号代替。

为使读者对冯亦代当年情形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另选入《我的鸣放》、《我的初步思想检查》、《我的悔改规划》三篇文章。文章均据手稿整理发表,未作任何删改。

李辉

2000年2月11日,北京

目 录

整理说明 / 001

一、我的鸣放

——在党总支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的发言 / 001

二、我的初步思想检查 / 013

三、冯亦代阴谋篡夺外文出版社

——同时在陶大镛费孝通指使下到各机关“放火” / 022

四、我的悔改规划(1958年7月2日) / 028

五、悔余日记(1958年7月—1962年4月) / 035

一

我的鸣放

——在党总支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的发言

不愉快的回忆是令人痛苦的。但是为了对党负责,帮助整风,不得不想想过去的事情。我想就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谈谈这几年我的遭遇和感受。

解放前和解放初党的温暖

从1938年开始,我接触到党,感到党对我的信任和帮助,没把我当成外人,感到党对我的温暖。1949年我参加革命,在国际新闻局任秘书长工作中,势必要接触到一些秘密,但党还是要我去做了。使我感到党的确把我当做人看待。但到了外文出版社以后,我觉得我是在像机器那样地被人使用着了。过去有两件事使我感动,而且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一件是戴望舒病时,乔木同志去

看他后对我说：天气冷，想办法给他生炉子。以后望舒死了，在追悼会上，乔木同志背了几首望舒的诗，那不是临时去念的，而是从心里背出来的。有一次我发烧，不知怎的被乔木同志知道了，他还叫谷羽同志打电话来问过我，我自己接的电话，我总觉得领导同志是随时在关怀干部的。

“三反”被陷害，至今原委不明，毫无结论

1952年“三反”时，我从大队中调回来搞业务，2月底到北京，3月18日就成嫌疑犯。我怎样成为贪污犯的呢？原来当时检查组中有个党员，他用逼供信的办法威胁一些被检查的同志，说冯亦代、尚立斋（当时的党支部书记，是个好同志）都已坦白，你不说就枪毙你。其中有位孙耀宗同志被迫承认，但他一晚睡不着，到四五点钟时翻供，这使他吃了更多的苦，被送进老虎班，“三反”后他第一天放出来，见了我就两行眼泪，说他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我一被当做嫌疑犯，刘尊棋同志告诉我，说要改组为出版社了，不需要秘书长，叫我到出版发行处去（我当时是兼的）。好，叫我去我就去，也不得不去。但从3月到8月做总结这段日子，不是人过的。“三反”总结由车卡做，我不知道那么严肃的事为什么学委会不做，叫他做。在总结中，提到我的问题，提法很恶劣，不严肃。他说有个同志把冯亦代同志咬了一口，说他贪污三千万，于是全场哈哈大笑，直到现在也没有人和我谈过我到底是不是贪污犯，我的结论是什么。

师哲说：“外文出版社既非人大， 又非政协，不需要民主党派”

外文出版社成立，叫我做办公室副主任，代理主任。说上级认为我不是党员，不能做主任。我想不通为什么非党人士不能做办公室主任。我们国家有这样的规定吗？既然不能做办公室主任，为什么又能做代主任呢？这是自相矛盾的，我觉得滑稽，而且是宗派主义的一个最好说明。

洪影在新华社呆不下去了，才到我社做办公室副主任。我和他坐对面，他做事不懂装懂，目中好像没有我这个人，那种自高自大真是少有。他面前人来人往，我则无事可做。我做代理主任一个多月，我们就没有共同谈过工作。

师哲同志本来我很敬重他，可是后来我看到他是教条主义和光说话不做事的官僚主义者。外文出版社歧视党外人士的严重宗派主义，应由他负责。他来不久，有次在会上公开说：外文出版社不是人民代表大会，也不是政协，不需要民主党派。现在大家说孙东文唐恺同志不重视民主党派的工作，我说根源是师哲同志。

本社成立到肃反结束，我过的 是小媳妇生活

从此一直到肃反后，在外文出版社里，我过的是小媳妇的生

活。上有公婆,下有妯娌,做人很难。

社里成立出版部,要我兼,我实在不愿意再做办公室工作,又怕提出来受批评。后来耐不住就和唐恺同志谈,到了出版部。最近出版部有同志问我是否有职有权?我说可说是有职有权,也可说是无职无权。问题不在部里,而在社级领导。如果无权,那末大批金钱就凭我签字付出去?但是在社里就不同了。社里有个社长集体办公,如果是党组,我没有意见,但今天还是可以批评为党政不分。如果不是党组,则出版社工作在社里是主要工作,那么为什么连研究社里出版问题也不叫我去参加。以突击书而言,往往决定了,却不通知出版部,造成多少工作困难。提了多少次意见,才略有改善。出版部的内部分工,体制是有问题的,1953年就提出要成立业务科,大家都同意,说很重要,但我走时还没成立。可是像保卫科通联组就成立起来了。我想如果是党员在那里负责,业务科就会成立。待遇上也不平等,别的部部主任甚至组长都有个办公室,出版部只能和设计科在一间,中间用橱隔起来,工作很不方便,要弄个墙,几年都拨不出这分钱,要个直通电话也几年都不给。说明领导并不知下面工作的苦恼,这些事与师哲同志之不尊重党外人士是分不开的。在国际新闻局就没有这种情况。师哲同志来后就没有问过我工作和生活上的问题。他说要开几条路,以贯通上下,出版部的同志们盼望他来谈谈,就是盼不到。他来三四年内,我只和他谈过两次出版部的工作,还是经过多次要求的结果;一次是指示必须在部内订立制度,第二次谈话是一个“无结果”。当时出版部有个秦萍同志,他和盛舜同志合作得不好。在向师哲同志汇报工作时,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你不必说,这件事我知道,你不必讲,问题是你部内部的制度。态度凶暴。这分明是

他不了解情况。因为当时部里,校对科,设计科都已订立了制度,就是出版科没有。出版科有个党员程天同志,他就不同意建立制度,科里同志写了一大堆意见,他锁在抽屉里,我领导不了党员科长。错误在党员身上,棍子都打在非党员身上,是何道理?肃反后检查工作,问题一大堆,我很难受,写了检讨,师哲同志批了两句话:长期地对工作关心不够,对业务研究不够。我觉得出版部其他同志批评我这两句话是可以的,师哲同志没有资格批评我。这两句话可批评他自己。老实说,不因过去国际新闻局关怀,有了深厚的感情,我早就离开不干了,社会主义社会不会饿死人的,只要劳动就会有饭吃。

1954年做总结,我在休假,还是回来开会,找材料,写出出版的一部分。到了总结的定稿拿出来,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出版工作,提了意见才加了几句毫无意义。

非党干部不受信任,一切都被蒙在鼓里

再说部内团结问题。当时文焘同志说要派个党员同志来,我很高兴,因为过去出版部政治空气薄弱。秦萍同志和我私人关系很好,但我要批评他,他来后,就是拿张报纸在沙发上看,不工作,一问三不知。这不是高深的学问,可是他不去了解。同志们批评部里没有分工,向党反映后,不知党做了哪些工作,至少问题并没有解决。工作出了问题,就找冯亦代。社里制定五年计划,作为出版部主任,我却不知道。据说要保密,不让主任知道。也是保密吗?我想五年计划是大家的事,既叫我负责就得让我知道。结果

印厂都知道了,我还是不知道,对非党干部就是那么不信任!关于部内的人事调动,朱玉成同志调部,我事先不知道,盛舜同志等到我知道他要去图编部时,早已木已成舟。校对科全科脱离出版部,也没有一个人和我正式谈过。

党员“家天下”的情绪浓厚

再谈政治待遇问题。在国际新闻局时,常常可以听到一些报告,有时可以参加党的会议。外文出版社要发到票子就很困难。像出版局组织的语法讲座,说我们不是业务部门,票子都拿不到。政治上不提高,怎么做得了工作。有时候我怀疑我在会上的发言是否起作用?评薪评级有个委员会,我也是委员之一。数出版科三个管印制的同志工作最重,评薪时,我就提出应提他们的级,会上大家都说对,但会后不知怎么又变了样。如果会里说话不算,那就根本不必有什么委员会。可是程天同志提级了,同志们说科长有成绩升级,但他的成绩如果没有其他同志的努力,又从那里来的呢?

另外为了改造书籍的装订,要到日本去买封面布,同志们跑了几个星期,进出口公司向日本发了电报,才把事情弄妥,我们打了报告,孙衷文同志批下来不同意,说是节省外汇,可是当他作了图编部的主任后,有天又说要到国外去买封面布了。

社里各部主任有等级,党员和非党员,参加社长联合办公的和轮不到参加的。党员主任也分等级。党外同志不被信任,好像对待资本家,利用、改造,我们即是利用而不改造,只有吃棍子。

外文出版社有堡垒,《时代》合过来后更严重了,因为《时代》的党员把严重的宗派主义带了过来。有次我到作协去开会,要个车子。要车单上非党科长签了字不算数,非要党员科长签字才开车。实在忍无可忍,我只好找张全吾同志。我希望党内整风时,好好整整,不要党员负责同志才算同志,非党的就不算同志!对非党同志的歧视,是党内一个大问题。这次我偶然拾到三反时同志们向我提的意见,一位党员同志说:“你为什么和周总理相识,是不是要向上爬?”说明有些党员同志的“家天下”的看法。

羊市大街其他同志的房子都粉刷了,为什么荒芜的就不刷?同志们提到我搬房子的事,我不是因文焘同志坐在这里说他没有责任。这件事应由张全吾同志和总务科负责。有一天总务科问我为什么还不搬家,我说没有通知我。即使房东让房客搬家也要在三个月或一个月前通知一声。第二天我在开会,老婆不在家,就在晚上搬到11点钟。黑板报批评我们有“牛科长”,我说还有“牛主任”。提到国会街出版部的主任办公室是在厕所旁边,其他党员主任办公室有哪个是在厕所旁边的。这间屋冬凉夏暖,白天点灯。要求几次搬都不得要领。这是歧视,说得好听些是不自觉的歧视!

统战工作存在缺点,在吸收知识分子 入党问题上,有关门主义倾向

师哲同志大概斯大林(理论)背得很熟,但对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就不大体会。党总支的统战工作只有陈龙同志在时做了一些。年年讨论,就是不改。老提老不改,不知为什么?党对盟的工

作不但不帮助,只有打击。像请冯雪峰同志来作报告的事,事前未和党谈妥,是盟不好。但临时阻止不开会,却并没有找我谈。事后孙衷文、刘尊棋同志把我找去,说我们做这件事与党的肃反工作步调不一致,言外之意,是破坏了肃反工作。这件事到现在我还想不通,这是没头没脑打棍子。民盟一直是提出在党的领导下工作,离开党就做不了工作,可是党总支又抓又放,事情很难办。冯雪峰报告事,差不多使盟垮了台。

关于知识分子入党问题。过去我认为我做个党外布尔什维克一样可以工作。后来乔木同志要我做盟的工作时,我的思想还想不通,只想入党。1949年我提出入党问题,1951年支部讨论过我的问题给了我些指示。1952年后车卡同志曾任党支部的组织委员,我和他谈入党问题,他说我们不能管,要上一级来处理。后来听说上级党要找荒芜、徐迟和我谈话,我们很兴奋。但到现在也没找去谈过。1953年我曾和李沃民(党支书)谈,他很鼓励我,但我自己想,还不合条件。1954年间孙衷文同志提出,后来说入党申请书找不到了,我说你到人事袋子去找找看,居然找到了。但是孙衷文同志和我谈了一次不着边际的话,使我如冷水浇头。希望党考虑今天知识分子要求入党的问题,不要把知识分子的要求看成是投机行为,不要戴一副有色眼镜去看他们,和他们谈话,要说清楚,是历史问题,还是现在条件不够。据我了解,有好几位同志要求入党的,现在心灰意懒。